

# 秦漢史

蕭伯璜 著



蕭伯贊著

秦漢史

北京大學出版社

# 秦 汉 史

翦 伯 赞 著

责任编辑：何瑞田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5印张 457千字

1983年5月第一版 1991年6月第二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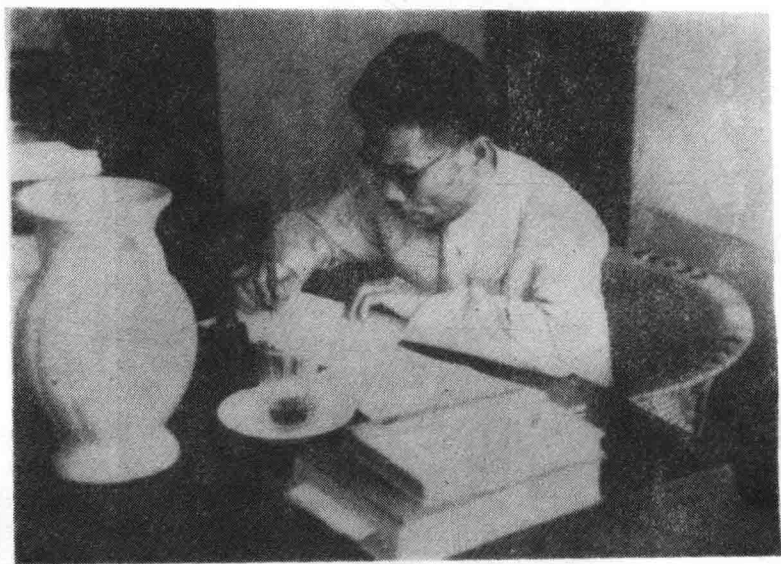
印数：0001—500册

ISBN 7—301—01412—0/K·103

定价：14.10元



葛伯赞同志



翦伯赞同志一九四八年在香港

翦伯贊著

# 中國史綱

第二卷：秦漢史

大東亞出版公司發行

《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

原版封面

曹操沛縣人。宦官曹嵩之子。（註五）曹嵩在灵帝時官至太尉，所以曹操自幼就過着貴族公子的生活。（註六）走狗放蕩無度。（註七）但為人機警，有權變而任俠。善舞戟，才武絕人，好談書，尤喜兵法，胸懷韜略，而文彩斐然。（註七）所以當時名士橋玄稱其為「命世之才」，許子將亦許其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英雄」。

（註五）魏志武帝紀謂曹嵩為宦官曹騰之養子，「冀能蕃其出生年未」。（註六）注云：「異人作曹操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

翦伯贊著《中国史纲》的手迹

伯赞同志：十封信收到，请放心是毫无庸。您的中国史纲  
 将出版稿，这封信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本件，为免致成为  
 闲人。我们极欢迎您多来信到新疆，将来为你们  
 翻印，请您一定来，我能去迎接，决定在宁夏等候您。未  
 时请同姓一道来，朗读完畢之後，或者同您进城去  
 「市井」也。高要口家来向您请，您反而耽误了您的  
 写作。我现在略三信，更加渴望您用「史纲」来  
 修改。

日高唯唯 弟 郭沫若

抄寄。故在人物中，  
 伯赞同志手迹

一九四二年郭沫若同志致翦伯赞同志信的手迹

## 校 定 本 序

本书是翦伯赞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撰写的，原题《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一九四六年七月、四七年六月，先后由重庆大呼出版公司和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当时，翦老计划写一部八卷本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第三卷，《魏晋南北朝史》；第四卷，《隋唐五代史》；第五卷《宋辽金元史》；第六卷，《明清史》（到鸦片战争）；第七、八卷，《近代史》。第一卷在一九四四年四月，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第三卷自抗战胜利后开始写作，至解放初，虽已写成二十余万字，但未做进一步的加工，亦未出版。其他各卷当然更只是一个计划了。我们这次对第二卷进行整理校订，考虑到《史纲》写作的实际情况，接受了同志们的建议，决定以原本的副题《秦汉史》为校定本的书名。

翦老决定写一部中国通史，是在一九三三年。可是那时“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方炽，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已侵占了我国的领土东北，他需要参加这两个方面的斗争。后来又用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撰写名著《历史哲学教程》一书。致使通史工作长期处于收集史料的阶段。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翦老又投身于伟大的“救亡”运动中。这年九月，他由南京回到长沙，和吕振羽等同志创立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开办俄语补习学校，主编《中苏》半月刊。他又与吕振羽、谭丕模、李仲融等同志发起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及政治训练班、讲演会等，还在南迁的北平民国大学教书，宣传、动员抗战。此时，他的通史工作完全停顿。一九三八年冬至三九年，翦老为了斗争的需要，由长沙先后转移到沅陵、溆浦。四〇年二月，又到重庆，住在巴县的歇马场。几经辗转，多年搜求的图书大半丢失，只剩笔记数篋相随。这年十



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次年一月，又阴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件”。此时的国民党统治区是一片白色恐怖，重庆一地更是特务横行，摇手触禁。周恩来同志为了保存干部，为将来的新的战斗做好准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制定了“三勤”方针，部署在重庆的党员和文化界进步人士，“勤业，勤学，勤交友”，就是要“闭门”读书，开展业务活动，深入学术研究，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翦老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了他撰写中国通史的工作。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翦老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关于〈孔雀胆〉》一文说：“在今年夏天，当寒暑表升到九十度以上的时候，我接到沫若先生的来信。他告诉我，他‘将在这火热的天气中，写一部火热的剧本’。而我在当时，却正在研究冰河时代的中国史。”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领会出当年老一代的文化战士在穷凶极恶的敌人的刺刀下，不畏强暴，智斗、巧斗、狠斗的情况。翦老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写完了第一卷。他于这年十一月十七日将这一情况函告郭沫若同志，郭老十分高兴，立即复信说：“十七日信奉到，读后甚感兴奋。您的《中国史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为兄贺，亦为同人贺。我们极欢迎您写好后到赖家桥来为我们朗读，请您一定来；我暂不进城，决定在这儿等您。”郭老对于翦老写通史一事如此重视，评价如此之高，说明了这部通史对于打击敌人的气焰，建立、建设进步的、革命的文化事业是多么重要。

翦老完成了第一卷的写作之后，接着开始了第二卷，也就是本册《秦汉史》的写作。此时重庆的斗争更加复杂尖锐，每个文化战士都要多条战线作战。据翦老说：“除了写作以外，我曾经有一个时期，作中国史的讲演。首先请我讲学的是冯玉祥，以后我在陶行知所办的育才学校、社会大学、郭沫若所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曹孟君所组织的暑期学习班等处讲授中国社会史。此外，也在复旦、朝阳等大学作过学术讲演。除了讲演以外，我也作过一些团结进步教授的工作，如发起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等。”至于

生活的艰苦，身体的病弱，特务的纠缠，自然给翦老的工作增加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可是翦老面对当时的形势，立场坚定，勇往直前，正如他在本书《序》中所说：“不管时代如何苦难，我总是走自己的路。”这本书也用了一年的时间写完。

在翦老的这本《秦汉史》出版之前，中国的史学界是个什么情况呢？作为“秦汉史”的专著来说，是没有的，重庆大道出版社于一九四五年出版的马元材著《秦史纲要》，只是“秦史”，而且只此一本。所以翦老在《序》中说：“秦汉的历史直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看到一部完整的科学的专著；有之，只是以一个章目列于诸家通史之中。”至于这些通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除了由新华出版社于一九四二年出版的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等少数著作之外，绝大多数则是资产阶级的，有些著作的基本体系或主要观点是反动的。

翦老的这本书问世，使中国的史学界有了第一部“秦汉史”专著，而且部头较大，有四十六万字。这部专著有如下三个重要特点：

**一、观点鲜明** 翦老写这本书和写第一卷一样，都是严密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各个方面，都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对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这段历史在整个中国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对于在这段历史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所出现的主要人物，都一一有所评价。不仅如此，翦老还很重视我国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在本书中用了三个专节讲述各有关民族的历史和社会，内容翔实，观点基本正确。这对史学界来说，一反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大汉族主义历史观，为以民族平等的态度撰述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树立了榜样。

**二、资料丰富** 旧的史学家对于秦汉史的研究，多于前四史之外，感到再无文献可证。因之有资料不足之苦。研究或撰述的方法，主要是编排、连缀从前四史中摘抄出的资料，再加以个人的标题或说明。这样的著作内容贫乏，资料单薄，千篇一律。翦老

在这部书中，不仅充分利用了前四史，还利用了《汉纪》、《后汉纪》、《东观汉记》、《七家后汉书》等史部书籍。此外，对经、子、集各部的有用文献，也最大限度地收集并加以利用。不仅如此，所用考古资料也很多。如汉简、石刻画像、碑刻、封泥、遗址和墓葬的发掘报告等等，都在使用之列。把考古资料从旧的金石学的狭小天地中解放出来，用以说明社会历史问题，翦老是开创者之一。这本书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正是他将文献和考古资料互相参证，互相发明，把秦汉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三、文章生动** 翦老认为：历史是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历史著作就不应“周诰殷盘，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而应在不影响科学性的原则下，尽量生动一些。这本书就写得很生动。他在分析一些历史原理、讲述一些制度条令时，都由于文笔生动而引人入胜。使本书生动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书中插入了二十幅地图和五十幅绘画。绘画中的大部分，是临摹于汉画象石，时代的、生活的气息极浓。文图并茂，进一步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使本书生色不少。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史学著作中，亦不多见。

本书的出版，虽属学术问题；可是在当时的革命与反革命两军对垒的情况下，则主要是政治问题。所以出版后的反响极大。革命的、进步的人们，往往多方购求，以先读为快。可是反动派或受其影响的人们，则忧心忡忡，乃至忿戾怨怼。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就赤膊上阵，一再发表文章，对本书乃至翦老本人进行攻击、辱骂。

解放以后，翦老已年逾半百，身体很弱，工作却日益加重。他当年撰写通史的宏愿已不易实现了。他想首先集中一点时间和精力将本书整理出版。一九五九年秋冬，我按照他的指示，对本书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并做了初步校订。此后，他改写并完成了第一编（秦）的第一章共三节。1961年春，他因担任了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并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一书，本

书的改写工作又告中辍。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被打倒以后，学术界的禁锢被逐步消除，科学研究欣欣向荣。不少同志认为，近三十年来，有关秦汉的考古资料固然发现极多，秦汉史的研究亦有很大的进展；但翦老的《秦汉史》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惟当年印数不多，或遭损毁，今天已查找不易，因此建议重新出版。我们长期跟从翦老学习或工作，整理此书，责无旁贷。整理的原则共有四条：“一理论、观点和文风一律不作改动；二、直接、间接引用的材料一一查对；三、根据横排的要求，重新标点；四、注意改正原本中的错别衍漏文字。”其他一些技术问题也有加工。主要有增补引文的出处，改绘地图，合二十幅为十五幅，于某些古地名下注以今地名等。总的工作由我负责，具体分工：

张传玺、何瑞田：第一编、第二编第三、七章，编制地图的草图。

邓经元：第二编第一、二章。

叶庆雨：第二编第四、五、六章。

杨济安：地理、地名。

整理工作得到北大历史系同志们的关心和支持，提了不少指导性意见。地图是北京市测绘处董怡国同志绘制的，插图是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马洪藻同志临摹的（原序说：插图五十幅，实为四十九幅），研究生冷鹏飞、岳庆平参加了校对工作。对上述同志，我们谨表谢意。

整理工作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工作匆忙，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周之处，希望同志们指正。明年冬天，是翦老开始撰写本书的四十周年，又是来北大历史系任教的三十周年。整理出版本书，既实现了翦老的遗愿，亦答谢他的春风化雨之情。

张 传 玺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午夜

# 序

## 一

本书所论述的范围，是秦汉的历史。

秦汉的历史直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看到一部完整的科学的专著；有之，只是以一个章目列于诸家通史之中。

一般地说来，中国历史之科学研究，其自上而下者，大抵皆停止在殷周阶段；其由下而上者，则又皆停止于鸦片战争。自殷周而后，迄于鸦片战争，这两千余年的历史，虽已曾有若干学者尝作初步之科学的探讨，但历史的具体演进，则尚有待于详细的研究。因此，当我们的研究进到秦汉时代，就要走进中国历史学上的荒原了。

虽然，研究秦汉的历史已不似研究秦以前的古史，令人感到文献之不足，或竟无文献之可征。秦汉的历史，特别是两汉的历史，已经留下了不少有系统的记录。其中最有名的巨著，是天才的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其次，是班固的《汉书》，范曄的《后汉书》，荀悦的《汉纪》。此外尚有清人姚之骅、汪文台等所辑谢承、薛莹、张璠、华峤、谢沈、袁山松、司马彪及佚名氏等所著诸家的《后汉书》。这些古典史籍和后来的辑逸，若把他们当作历史，虽班马亦不敢轻许；但当作史料，则上列诸书都是研究秦汉史的最好资料。

《史记》、《汉书》、《后汉书》，自唐以来，即列为正史。历来研究汉史的学者，都用这几部书作根据。迄于清代，对于这几部书之注释、疏证、探源、索隐、正义、考异、辩惑、志疑、纠缪、刊误之作，已汗牛充栋。我们不能说这一类后起的著作对于秦汉

史的究明没有或多或少的贡献；至少对史料之订正，有其一面的劳绩。但是这样寻章摘句的研究，决不能使秦汉的历史显出光明；甚且因为这类著作之支离烦琐、陈说纷纭，反而淆混了原著中之秦汉史的本来面貌。

## 二

秦汉史之得以从繁复的史料中理出一个眉目来，这是近年来科学研究的成果。但迄至现在，科学所达到的范围，只是对文献上的史料之批判与分类；而这对于秦汉史的究明，还是非常遥远。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从文献的史料中去钩稽秦汉的历史；只是说，如果有了新的考古学上的发现，我们便应该尽可能地运用考古学上所提供的新史料，去订正文献上的史料之伪误，补充文献上的史料之缺失。接收考古学的成果，使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为一，这是历史科学的任务。

近三四十年，由于中西考古学者的努力，两汉的遗址和遗物，在中国西北新疆、甘肃一带，大有发现。特别是斯坦因氏的发现，最为重要。斯氏在新疆前后考古三次，曾著《和阗埋没的古址》、《古和阗》、《沙漠契丹废墟》、《近印度》、《亚洲腹部考古记》及《西域考古记》等书，报告其发现。他在于阗附近的尼雅，曾发现汉代精绝的废墟；在罗布泊的沙漠中，曾发现楼兰的古城（王国维氏谓此古城非楼兰）和许多汉代的古垒；在敦煌西北，曾发现汉代极西的古长城遗址。这些新的发现，使两汉的历史，显出了不少的光明。

例如从古长城的发现，即指明汉代的长城并不终止于酒泉，而是伸延到今日敦煌的西北，因而法显《佛国记》中所谓：“敦煌有塞”；《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中所谓：“玄盛乃修敦煌旧塞”的记载，由此得到新证。又如从罗布泊沙漠中成列的古垒之发现，即指明汉代自敦煌以西，直达楼兰，沿途都筑有堡垒，以防止匈奴人的侵袭，因而《汉书·西域传》所谓：“自敦煌至盐泽，

往往起亭”的记载，又得到新证。又如据斯氏的报告，敦煌西北的古长城，不是用砖石砌建，而是用苇杆挟泥土砌筑起来的，因而《后汉书·班超传》中所谓：“焉耆有苇桥之险”的“苇桥”，才知道他正确的解释。又如从新疆、甘肃一带的遗址中，有用古窠利文、佉卢文、印度文字写的书简之发现，即指明当时塔里木盆地及南山北麓的国际大道上，已有不少“深目多髯髯”的中亚商人往来贸易，而《史记·大宛列传》所谓武帝“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的记载，又获得了印证。以上的发现，对文献上的史料，都是有力的补充。

此外如从罗布泊沙漠中之汉代古钱及其他遗物的发现，竟使西汉时代通达西域的古道由此再现；并且把当时东西商人所贩卖的商品再呈现于我们的眼前。如从楼兰及于阗附近的汉代住宅遗址之发现，又使我们知道汉代在西域的官署之建筑的式样，大抵都有一间华美的大客厅，此外有厢房、厩栏、冰窖、监狱和营房，还有幽雅的花园。从那些至今还倒卧或直立在沙漠中之成列的白杨、红柳和各种果树的死干，还可以想见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绿荫如梦的荫道。从那些死去了的葡萄藤，又可以想见当他们垂着累累紫实的时候，汉代诸帝还健在人间。在这里留下来的家具虽然局部腐朽，仍然可以看出富丽的雕刻；留下来的文书虽然大半破坏，仍然可以看出记录的事件；留下来的炉灶虽然久绝烟火，仍然可以看出原来的式样。这一切的陈迹几乎把汉代官吏在西域的生活再现出来；而这在文献的历史中，是梦想不到的。虽然这些发现只是当时的边疆文化，但这些边疆文化，正是当时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 三

除遗址与遗物外，第二个大发现，便是在敦煌和居延所发现的汉简。敦煌汉简自斯坦因氏发现以后，经沙畹博士考证，印于沙畹所著《流沙中发见的汉文书》一书中。以后王国维氏又择其精华

辑为《流沙坠简》一书(拓片一卷,考释三卷,补遗及附录一卷)。《居延汉简》自贝格曼发现以后,久经秘藏,最近劳干氏辑为《居延汉简考释》一书(释文四卷,考证二卷)。《居延汉简》较《敦煌汉简》发现为迟,但其数量则较敦煌所发现者多出数倍。敦煌与居延两地所发现的汉简内容大抵相同,皆系汉代西北边防军留下来的文书、簿籍、信札及经籍之类的东西;因而其所记载,大都皆系屯戍、烽燧、戍役、廩给、器物及边塞杂事之类。这些记载大半都是文献的历史中记而不详,或根本没有的,所以是一种崭新的史料。

汉代的烽燧制度,从《汉书》和《后汉书》的记载中,是无法考证的。自汉简发现后,遂可得而详知其具体的组织和内容。从汉简的记录中,我们知道在两汉时代,自河西四郡,西至盐泽,皆有烽燧的设备。五里一燧,十里一敦,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塞。此等烽燧,分隶于四郡太守。太守之下,有都尉、候官、鄣尉、候长、燧长,以下则为戍卒。举烽的方法,昼夜不同。白昼放烟,夜晚放火。又视敌人数目之多少而有各种不同的暗号,《居延汉简》有一简曰:“五百人以上能举二烽。”同时,汉简中并记载着若干烽燧的名字。晚近王国维氏把这些烽燧的名字配合考古学上的发现,加以互证,于是敦煌西北沙漠中之汉代的废垒已骤可得而呼其名(《流沙坠简》释文及后序)。假使他日居延一带的汉代废垒亦能有所发现,则今日《居延汉简》中之烽燧的名字也就可以考定他们的地位了。

此外,从汉简中我们还知道许多新的史实。如在戍卒的名册中,对于每一戍卒出生的郡、县、里,都有详细的登记,因知汉代户籍法的严密。在器物的簿籍中,常见的兵器是弓矢,并常有领取铜矢的纪录,因知当时驻防边塞的军队多为骑射部队,而且还在使用铜矢。在流水账簿中,常见有购买牛羊鸡豚姜酒肝肺舌等食物的日用账,又知当时边防军军官的生活甚为优裕。而且从《居延汉简》中“肉百斤值七百”的记载,又知当时的肉价,每斤只值



七个铜钱。此外，如汉简中常有“以邮行”、“以次传行”及医方的记录，又知当时边防军中有军邮和军医的设备。凡此，都是在文献的历史中看不见影子的。

## 四

除实物和简牍外，汉代的石刻画像也提供了不少新的史料。汉代的石刻画像，如武氏祠、孝堂山祠、两城山及武阳石阙等石刻画像，皆传世已久；但并未引起历史家的注意。晚近南阳一带汉墓中，又发现了大批的汉代石刻画像，始有若干学者开始对石刻画像作艺术的研究。我以为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像。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汉代的石刻画像都是以锐利的低浅浮雕，用确实的描写手腕，阴勒或浮凸出它所描写的题材。风景楼阁则俨然逼真，人物衣冠则萧疏欲动；在有些歌舞画面上所表示的图象，不仅可以令人看见古人的形象，而且几乎可以令人听到古人的声音。这当然是一种最具体最真确的史料。

例如从石刻画像中楼阁宫室的构图，我们便了然于桓宽所说的汉代贵人之家“兼并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骛”之语。从石刻画像中的乐舞图像，我们便了然于仲长统所说的豪人之室，“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之语。看侏儒舞的画像，则《徐乐传》所谓“帷幄之私，俳优侏儒之笑”如在目前；看戏兽的画像，则张衡《西京赋》所谓“熊虎升而擎攫，猿犹超而高援”之态，跃然纸上；看乐队的画像，则流徽鸣鼓，如闻其音；看战争的画像，则矛挺搏击，如历其境。此外，还有许多描写风俗、记录传说、鼓励道德、宣传信仰的画像，不及备举。总之，这些石刻画像假如把它们有系统的搜辑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